

## 松-紧文化：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

卢俊 陈浩 乐国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350)

**摘要** 松-紧文化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 它发轫于人类学的文化田野考察, 致力于刻画不同文化间社会规范强度和对偏差行为宽容程度的结构性特征。松-紧文化有其较为明确的概念定义和成因, 以及在国家、区域和个体层次上的测量方法。松-紧文化已广泛运用于自我、人格、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判断与决策、创新、脑认知神经和基因、恐怖主义与社会和谐等心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主题之中。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甄别细分社会规范中的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 并综合吸收其它研究视角的长处。

**关键词** 松-紧文化; 跨文化心理学; 社会规范; 文化人类学

**分类号** B849:C91

人类离不开社会规范。它约束着我们的心理和行为, 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规范不仅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 更是人类社会漫长历史进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公元前 400 多年的古罗马时代,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游记《历史》(*The Histories*)中, 就已谈及了西方诸国的社会规范和它们彼此间的差异(希罗多德, 420 B.C./1959, p125, p147, p200, p211)。斗转星移, 岁月并没有磨灭哲人和智者们对这一领域的好奇与探索。有这样一种文化维度, 以社会规范的“松-紧”程度, 来刻画世界各地文化面对偏差行为时社会规范的强度与惩罚度, 这就是“松-紧文化”(tight-loose culture, or cultural tightness and looseness) (Chan, Gelfand, Triandis, & Tzeng, 1996; 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 Gelfand et al., 2011; Triandis, 1989)。

较早涉及松-紧文化的描述, 散见于文化人类学家 Benedict (1934)、Mead (1937)等人的田野考察文本之中。Embree (1950)研究泰国文化时, 发现泰国与日本之间, 存在鲜明的文化松紧性反

差。他认为泰国为松文化, 日本为紧文化。此后, 又有多位人类学者的研究涉及了松-紧文化。譬如, Ryan 和 Straus (1954)对僧伽罗人(Singhalese), Oliver (1965)对坎巴人(Kamba)的研究。但国际学术界较共识性地认为, 系统的松-紧文化研究肇启于 Pelto (1968)发现很多传统社群, 例如爱斯基摩人(Eskimo)、库贝欧人(Cubeo)、哈特人(Hutterites)、桑布鲁人(Samburu), 在社群文化松紧性上彼此之间呈现出的差异。他奠定的研究体系基础得到了后续研究者持续的关注与发展。社会学家 Boldt 及其合作者也以哈特社群文化为考察对象, 对松-紧文化进行了理论思辨, 试图将其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做一个联结(Boldt, 1978; Boldt & Roberts, 1979)。跨文化心理学巨擘 Triandis (1989, 2004, 2011, 2013)和他的学生 Gelfand (Gelfand et al., 2006; Gelfand, 2012; Gelfand & Harrington, 2015; Gelfand et al., 2011)是松-紧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他们将这一概念维度推向了全新的学术高度。

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规范所反映出的松紧性差异, 从一个新视角增进了我们对人类心理与行为差异的理解和预测(Chan et al., 1996; Gelfand et al., 2006; Gelfand et al., 2011; Gelfand & Harrington, 2015; Norenzayan, 2011), 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瞩目(Chiu, Gelfand, Yamagishi, Shteynberg, & Wan, 2010; Fischer, 2013; Minkov & Hofstede, 2014;

收稿日期: 2016-07-20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H03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532005)

通讯作者: 陈浩, E-mail: hull1919@gmail.com

Morris, Hong, Chiu, & Liu, 2015; Mrazek, Chiao, Blizinsky, Lun, & Gelfand, 2013; Ng, Morris, & Oishi, 2013;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 Schwartz, 2014)。

## 1 松-紧文化的概念、澄别与成因

### 1.1 松-紧文化的概念

松-紧文化中的“紧”指规范强,对偏差行为包容度低(惩罚强);而“松”是指规范弱,对偏差行为包容度高(惩罚弱)(Gelfand et al., 2011)。松-紧文化包括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规范的强度,或者说规范的清晰度与普遍性;第二是惩罚程度,或者说是偏离规范行为的宽容度(Gelfand et al., 2006)。因此,松-紧文化指的是反映对偏差行为的惩罚度与强度的社会规范文化。

上述为松-紧文化的理论性定义,目前公认的操作性定义主要是:通过随机抽样,以国家内部一定数量的个体主观感受到的人们行为活动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程度,作为该国文化松紧程度的指标。具体通过“松-紧量表”来施测,总共有6个项目(Gelfand et al., 2011)。此外,还有研究者利用已有价值观调查的二手数据,以价值观离散程度作为松-紧文化的操作性定义(Uz, 2015)。最后,松-紧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不仅国家间存在松-紧文化差异,而且国家内部也存在松-紧文化差异,又提出了国家内部州省层面的松-紧文化操作定义:分别以教育规范方面的惩罚程度、死刑率、同性婚姻比率、信仰自由程度等可量化指标来反映(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总之,就理论概念而言,松-紧文化有比较统一的定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为研究者所测量层面的不同,以及便于操作的数据来源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没有背离松-紧文化在社会规范范畴内的理论性定义(上述不同操作定义的更细致阐述,在本文的“松-紧文化的测量”有详细介绍)。

从测量角度上看,松-紧文化是一维两极的概念,一维指松-紧文化维度,两极指松端与紧端。默认测量分值越高,文化越紧;分数越低,文化越松。例如,巴基斯坦就明显比巴西的分数要高很多,这意味着巴基斯坦比巴西文化要紧得多。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系数为正代表与松-紧文化的紧端(紧文化)正相关,相关系数为负代表与松-紧文化的紧端(紧文化)负相关。例如,松-紧文化

分数与个体主义相关系数为-0.47,意味着个体主义与紧文化存在负相关。

松-紧文化概念体系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Embree (1950)研究泰国文化时,虽然提出了松-紧(close-loosely)的称谓,但只是人类学白描,并未赋予其理论内涵。Ryan和Straus (1954)进一步对松文化提出了他们的见解:(1)社会规范可以灵活表达;(2)偏差行为容易被宽容;(3)群体价值观、礼仪仪式、责任性、团结性不发达。他们明确提出了“社会规范”和“对偏差行为的宽容与否”等松-紧文化核心要义,但只强调了松的一面,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松-紧文化”概念,更缺少操作性定义。在后续研究中,人类学家Pelto (1968)确定了松-紧文化从松到紧的12条标准,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一维两极概念,使其可以在不同文化社群研究中施测,为松-紧文化的概念科学化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Pelto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规范是松-紧文化概念的核心,而是从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特征的松紧性来定义松-紧文化,这与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界普遍公认的松-紧文化概念核心尚存在一定区别。Triandis (1989)在分析文化对自我的影响时,已将松-紧文化维度看作是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并列的一种文化维度概念。Gelfand等(2011)通过大规模跨文化社会规范的松紧性感知的心理测量,则进一步凝练并确立了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界公认的“松-紧文化”核心要素:社会规范强度和对偏差行为的宽容度。

### 1.2 与其它重要文化维度间的澄别

作为一种新的跨文化心理学维度,松-紧文化与其它主要的跨文化心理学维度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在此,笔者分两部分阐述。首先,出于个体-集体主义(个体对对内群体的依存程度;Triandis, 1989)跨文化维度的公认影响力,重点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然后,系列展示松-紧文化维度与其它重要跨文化维度间的统计关系。

一方面,个体-集体主义与松-紧文化存在关联。传统社群研究显示,松-紧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存在明显关系(Carpenter, 2000)。一般而言,文化越紧,集体主义越强。基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亦表明,松-紧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存在显著相关(Gelfand, 2012; Gelfand et al., 2011),文化越松,个体主义越盛。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区别。首

先,在主题关照上,松-紧文化围绕社会规范为研究中心,而个体-集体主义以价值观为研究中心(Gelfand et al., 2006; Gelfand et al., 2011)。松-紧文化明确提出对社会规范的关注,是对既往跨文化心理学过于关注价值观的弥补。其次,在概念内涵上,个体-集体主义是关于个体依附于其所在内群体的强弱程度(Trandis, 1989),而松-紧文化是关于规范的强度及执行力度强弱(Gelfand et al., 2006; Mrazek et al., 2013)。对此, Triandis (1989)曾引用1987年5月《北京日报》(Peking Daily)上的一个具体案例予以说明,集体主义并不等于紧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一个学生行为一直比较独特、怪异,一直到他杀害了一个同伴后才发现他有严重心理疾病,但在犯事之前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包容了他这个独特、怪异的“个体主义者”。复次,在行为预测上,对行为本身的限制性是文化松-紧性的要义之一。从松-紧文化维度出发,社会行为可直接在行为层面上予以预测;而个体-集体主义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则需要间接通过人们价值观的选择来进行,其行为结果还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很大影响(Gelfand et al., 2011)。而且,在跨文化心理测量实践中存在集体主义和紧文化并存国家(日本、新加坡)、集体主义和松文化并存国家(巴西)、个体主义和松文化并存国家(美国、新西兰)、个体主义和紧文化并存国家(德国、澳大利亚)(Gelfand, 2012)。以上表明,松-紧文化维度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是既存在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两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

松-紧文化与权力距离维度也存在一定关系。强调秩序是紧文化的要义,同时也是高权力距离文化的特征之一(Gelfand et al., 2011)。因此,一般情况下,紧文化和高权力距离存在关联,但并不是所有的紧文化群体的权力距离都大,以色列的基布兹社群(Kibbutzim)虽然是典型的紧文化,却比较讲究平等(Pelto, 1968)。松-紧文化与不确定性规避也存在关系,因为不确定性规避具有认知闭合需求的某些特征,紧文化也具有类似特征。相对于松文化中的个体,生活在紧文化中的个体更需要结构性(Gelfand, 2012);文化越紧,不确定性规避越强(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但也有与之相左的研究结论:文化越紧,不确定性规避越弱(Hofstede, 2001);文化越紧,不确定性规避极其微弱(Minkov & Hofstede,

2014)。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与各自采用的不同样本有关。松-紧文化与男子气-女子气、长期导向维度相关不显著(Gelfand et al., 2011)。

Gelfand 等人(2011)曾对松-紧文化维度和四大类(文化价值观、社会公理、指导资源、国家财富与增长竞争力)共36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进行过实证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松-紧文化和这些文化维度之间,绝大多数存在着中低程度或不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松-紧文化维度与它们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同时又具有很强独特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松-紧文化与个体主义存在较高度度的负相关,与家庭集体主义、多劳多得、精神性、“我们国家拥有普遍信念”存在较高度度的正相关。从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测紧文化国家比较强调精神上的一致性。表1是松-紧文化与其它文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

### 1.3 松-紧文化的社会生态成因

无论基于传统社群还是基于现代社会的研究,均证明了世界各地文化间存在松紧性差异(Gelfand, 2012)。那么,是怎样的原因在塑造这种文化松紧性?

Embree (1950)通过对泰国和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曾推测泰国文化之所以比日本要松,主要因为泰国处于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交界位置,需要更包容的态度和更宽容的政策,所以呈现出松文化特征。这虽是一种基于人类学考察的推测,却开启了对于松-紧文化成因的探索之路。其后, Pelto (1968)系统提出了松-紧文化成因的三个方面:(1) 血缘体系:史前社会中,单系血缘关系(父系或母系)社群一般趋于紧文化,而双系血缘关系(父系和母系,父系与母系具有同等权重)社群一般趋于松文化;(2) 相对于依赖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的社群,依靠种植生产方式的社群文化更紧;(3) 人口密度是松-紧文化的第三个成因,人口越密,文化越紧。后续研究者继承了 Pelto 提出的三种成因因素,并补充了文化同质性和与外界隔离性是松-紧文化的另外两种成因(Chan et al., 1996)。文化同质、与外界隔离和紧文化存在关联;文化异质、与外界沟通和松文化存在关联。不过上述松-紧文化成因判断,都基于有限的样本考察和理论思索。Gelfand 等(2011)通过对33个国家的松-紧文化测量以及与相应的历史、社会生态特征相关分析,发现松-紧文化与病菌传播、领土争执、资源匮乏、自然灾害、历史冲突和人口密度

表1 松-紧文化和其它文化维度间的相关系数表(转引自 Gelfand et al., 2011)

文化维度	文化维度来源	N	相关系数	p 值(双尾检验)	效应量( $\eta^2$ )
<b>文化价值观(Culture Values)</b>					
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Hofstede (2001)	30	-0.47	0.01**	0.22
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	Hofstede (2001)	30	0.42	0.02*	0.18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	Hofstede (2001)	30	-0.27	0.16	0.07
男子气(Masculinityindex)	Hofstede (2001)	30	-0.08	0.68	0.01
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index)	Hofstede (2001)	14	-0.05	0.87	0.00
和谐性(Harmony)	Schwartz (1994)	22	-0.26	0.24	0.07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Schwartz (1994)	22	0.43	0.04*	0.18
阶层性(Hierarchy)	Schwartz (1994)	22	0.47	0.03*	0.22
掌控(Mastery)	Schwartz (1994)	22	0.18	0.42	0.03
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	Schwartz (1994)	22	-0.23	0.30	0.05
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	Schwartz (1994)	22	-0.28	0.20	0.08
平等承诺(Egalitarian commitment)	Schwartz (1994)	22	-0.41	0.06 <sup>†</sup>	0.17
家庭集体主义(Family collectiv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49	0.01**	0.24
制度集体主义(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43	0.03*	0.18
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35	0.08 <sup>†</sup>	0.12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House et al. (2004)	26	0.32	0.11	0.10
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	House et al. (2004)	26	-0.35	0.08 <sup>†</sup>	0.12
决断力(Assertiveness)	House et al. (2004)	26	-0.29	0.15	0.08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House et al. (2004)	26	0.32	0.12	0.10
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47	0.02*	0.22
人文导向(Humane orientation)	House et al. (2004)	26	0.30	0.13	0.09
忠诚 vs. 功利卷入(Loyalty vs. utilitarian involvement)	Smith et al. (1996)	26	0.45	0.02*	0.20
<b>社会公理(social axioms)</b>					
命运控制(Fate control)	Leung& Bond (2004)	25	0.44	0.03*	0.19
精神性(Spirituality)	Leung& Bond (2004)	25	0.52	0.01**	0.27
多劳多得(Reward for application)	Leung& Bond (2004)	25	0.60	0.01**	0.36
犬儒主义(Cynicism)	Leung& Bond (2004)	25	0.14	0.49	0.02
灵活性(Flexibility)	Leung& Bond (2004)	25	-0.20	0.33	0.04
<b>指导资源(Sources of Guidance)</b>					
垂直资源(Vertical sources)	Smith et al. (2002)	29	0.40	0.03*	0.16
我们国家拥有普遍信念 (Beliefs that are widespread in my nation)	Smith et al. (2002)	29	0.54	0.01**	0.29
不成文规定(Unwritten rules)	Smith et al. (2002)	29	0.18	0.35	0.03
专家(Specialists)	Smith et al. (2002)	29	-0.18	0.35	0.03
<b>国家财富与发展竞争力 (National Wealth and Growth Competitiveness)</b>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ita)	Kurian's World Ranking (2001)	33	0.05	0.79	0.00
全球发展竞争力(Global growth competitivenes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2-2003)	30	-0.08	0.68	0.00

注: <sup>†</sup> $p \leq 0.10$ , \* $p \leq 0.05$ , \*\* $p \leq 0.01$ ; N 表示与 Gelfand et al. (2011)所测 33 个国家中重合国家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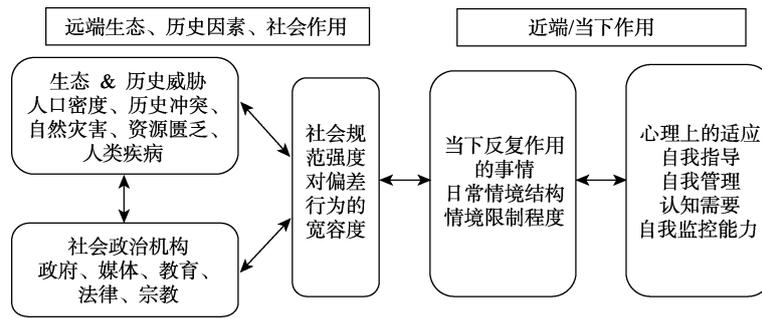


图1 松-紧文化系统模型(转引自 Gelfand et al., 2011)

等存在很高相关,且它们与当下日常情境结构、个人心理适应性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松散结构,见图1。

虽然Gelfand等(2011)在实证层面开始尝试揭示松-紧文化与其它社会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及其中可能的因果关系,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松-紧文化如何从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被孕育出来的过程机制。Mrazek等(2013)对社会生态、基因、松-紧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链条分析,发现生态威胁易感性以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为中介预测文化松紧性。生态威胁越大,具有短臂基因的人分布几率越高,从而使文化趋紧;生态威胁越小,具有短臂基因的人分布几率越低,从而使文化趋松;其中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为了进一步确定社会威胁与文化松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松-紧文化研究者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采用进化博弈游戏研究范式,证明社会威胁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规范一致性要求和对偏差行为的惩罚(Roos, Gelfand, Nau, & Lun, 2015),即社会威胁造就紧文化。

松-紧文化的研究者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究,从小样本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经验到大规模的跨国人群心理测量,从理论推测到实证检验,从历史、生态、社会、基因等方面一步步揭示松-紧文化的成因。

## 2 松-紧文化的测量

作为一种跨文化心理学维度,松-紧文化的实证研究最先开展的是宏观国际水平的测量研究,然后拓展至国内州际区域水平和微观个体水平的测量研究。依此,笔者按照先宏观后微观的次序,分国家、区域、个体三方面述评相关内容。

### 2.1 国家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1)以平均数为指标的松-紧文化测量。Gelfand等(2011)采用主体间性视角(主体间性测量的并非是被试个体内感受,而是被试对周围人或环境的感知;Chiu et al.,2010)开发了《松-紧量表:社会规范强度与偏差宽容度》(Tightness-looseness Scal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and Tolerance of Deviance;后文简称“松-紧量表”)。该量表包括6个项目:1)在这个国家,有很多需要人们遵循的社会规范;2)在这个国家,大部分情境下对人们如何行事有明确的期望;3)在这个国家,人们一致同意大部分情境下怎样的行为是合适或不合适的;4)在这个国家,人们在大部分情境下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如何行动(反向计分);5)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适宜,其他人会强烈地反对;6)在这个国家,人们几乎总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该量表项目的评级从“强烈反对”到“强烈赞成”,采用6点Likert计分,根据每个国家被试整体平均数确定该国的文化松紧程度。Gelfand等(2011)使用该量表对33个国家的6823名被试进行过测量,发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是依次处于最紧端的3个国家,乌克兰、匈牙利、爱沙利亚是依次处于最松端的3个国家。

(2)以标准差为指标的松-紧文化测量。松-紧文化的绝大部分测量主要以均值为指标。Uz(2015)独辟蹊径,采用标准差来反映松紧文化程度。Uz合并了欧洲价值观研究(European Values Study, EV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数据,合成为新的EWVS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68个国家(伊朗和以色列因为数据不足被排除)的101,172个个案,由三类指数构成:1)特定领域指数(domain-specific index),具体指道德行为争议

分量表的项目,包含所有68个国家的数据信息;2)普通领域指数(domain-general index)由124个项目组成,包含64个国家的数据信息;3)联合领域指数(combination index)由研究者根据经验对EWVS中的项目分组,经过因子分析,抽取工作、家庭、宗教三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54.4%),然后依据每个国家答题者对这三个方面重要性的评估进行加权,来反映国家层面对偏差行为的规范强度和宽容度。Uz(2015)得出的松紧文化上的国家差异,与Gelfand等(2011)的研究存在一定区别,个别国家(印度)甚至相反。Gelfand等(2011)的松-紧文化分数和Uz研究中的联合领域松-紧文化指数相关不显著,与Uz(2015)研究中的具体领域和普通领域指数相关显著。Uz所采用的方法符合松-紧文化对偏差的定义,可以从其它价值观、信念等调查数据的离散分布程度来度量国家文化松紧性,并非一定要开展专门针对松-紧文化的跨国跨文化调查,大幅扩展了松-紧文化测量的数据来源。由此可以把Uz(2015)的测量方法看成是对Gelfand等(2011)《松-紧量表》测量方法的一个有力补充。

## 2.2 区域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1)传统社群的松-紧文化测量。松-紧文化区域层面的测量,最早可追溯至人类学家Pelto(1968)对北美的哈特人、东非的桑布鲁人、伊朗的布涅瑞人(Busseri)、芬兰的斯克特·拉普斯人(Skolt Lapps)等23个传统社群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他依照格特曼(Guttman)量表形式,开发了《松-紧12项目量表》(12 point tight-loose scale),首次尝试建立松-紧文化测量工具,意图结束既往人类学家在“松-紧”标准上的模糊和争议。该量表包括从松到紧的12个梯度:1)能认识到政治管控的存在;2)根据法规使用暴力;3)社群内的政治权力是有差异的;4)对经济产品进行征收,包括货币形式,譬如税收;5)神父和宗教实体的存在;6)对劳动力的征用;7)神职或宗教团体的世袭;8)疾病的治疗为大社群、分社群领导者或神职人员所掌控;9)产权和生产物品使用以团体为主;10)共有储存物品;11)对精神文化的团体控制;12)神权政体。Pelto(1968)利用该量表测量了不同社群的文化松紧性,发现原来不少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松文化的社群,其实只是处于文化松紧性的中间位置。其后,他与合作者进一步把这种松-紧文化标准扩展到对

63个传统社群的考察中(Hutter & Pelto, 1972)。Pelto使用的测量方法并不复杂,但为统一测量不同社群的文化松紧性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正如Pelto(1968)本人所言,“能够应用于所有不同地区的跨文化研究”。

(2)现代州省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跨文化研究中国家间文化比较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忽略了国家内(within-nation)存在文化差异的现实。松-紧文化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美国国内的50个州,尝试研究国家内部州际层面上的松-紧文化差异(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测量分为四个方面,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客观度量,由美国各类数据库既有指标数据构成,包括4个方面9个项目。第一个方面为惩罚强度,包括4个项目:1)学校体罚合法性;2)学生在校被惩罚比例;3)1976年~2011年间的死刑率;4)违反法律的惩罚严厉度(比如售卖、使用或持有大麻)。第二个方面为宽容度,包括两个项目:1)获得酒精饮品便利性(比如每个州主张禁酒的县比率);2)同性婚姻合法性。第三个方面为针对维护道德秩序和约束行为的社会信仰测量,包括2个项目:1)州层面的宗教性氛围;2)个体声称无宗教信仰的比例。最后一个方面是每个州的外国人比例,用于反映州层面的国际多元化和混合文化氛围,体现松文化的特征。测量结果反映出美国州层面上存在极其显著的松-紧文化区域差异。文化最紧的三个州依次是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文化最松的三个州依次是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

## 2.3 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虽然松-紧文化属于文化间比较维度,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应用于个体层面测量,毕竟最初Gelfand等(2011)就是基于对33个国家的6823名被试个体作答结果,合成了国家层面松-紧文化得分。而在同一种文化下,不同个体所感受到的文化松紧性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松-紧文化量表在个体层面上施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完全没有改动《松-紧量表》,另一类则根据实际试测情况对《松-紧量表》中的某些项目有所改动。

(1)对原量表项目没有改动的测量。Merriweather(2014)完全使用《松-紧量表》,按照Gelfand等(2011)的测量方法,以田纳西州某大学选修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他们对高中校

园生活的回忆, 测试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水平。松-紧文化的测量还被应用于脑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 Han, Glover 和 Jeong (2014)为了测试文化差异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 是否存在相关脑区激活水平的差异, 选取韩国和美国被试进行了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

(2)对原量表项目有改动的测量。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等原因, 原《松-紧量表》的部分项目可能需要做出一定改变。Li, Fock 和 Mattila (2012)从香港大学招募了95名大学生, 采用《松-紧量表》用于测试被试间的松-紧文化水平差异。他们以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差异为自变量, 研究被试在服务过程中被冒犯后, 接受物质道歉和礼节道歉上的差异。具体测量过程为: 在施用这个量表前研究确保了被试对英文原量表没有阅读上的困难, 原量表中有一个项目被剔除(与整体相关较低), 从强烈赞成到强烈反对6点计分, 剩下5个项目。虽然信度不太高(0.61), 但研究者认为, 鉴于前人的科研经验以及文化的丰富性, 可以接受。个体层面的松-紧文化测量还被应用于人格特质研究领域。Church 等(2013)为了研究松-紧文化、自我决定理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松-紧量表》的基础上又添加了9个新项目, 平衡了正向与反向提问。新量表在8个国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表现良好( $0.55 \leq \alpha \leq 0.82$ )。

松-紧文化维度测量是从事有关松-紧文化实证研究的必要环节。不仅跨文化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 已开始吸收松-紧文化作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变量。其中部分研究因实际情况对原《松-紧量表》的改进, 可以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同时, 各个层面上的测量, 为我们探究涉及松-紧文化的心理变量提供了一个多水平操作框架, 有助于松-紧文化在心理学各具体领域的深入拓展。

### 3 松-紧文化与心理学具体研究领域

与紧(松)文化相对应的日常强(弱)情境约束,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而长期地规制着人们的行为, 人们的各种心理由此因应养成, 形成了不同且相对稳定的特性或模式(Gelfand et al., 2011)。

#### 3.1 松-紧文化与自我

自我概念受不同文化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特征, 譬如, 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更倾向于形成互依自

我, 而在个体主义文化影响下更倾向于形成独立自我(Triandis, 1989; Markus & Kitayama, 1991)。就松-紧文化而言, 文化越松, 个体可选择的榜样越多, 当存在多种榜样时, 为了避免价值观、角色的冲突, 个体则会同时拒绝多种榜样, 而发展适合个人的自我概念。换句话说, 文化越松, 个体倾向于选择私下自我(private self); 文化越紧, 可供选择榜样越少, 个体则倾向以公共的、集体的自我为榜样(Triandis, 1989)。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合理之处, 但缺乏实证检验。Carpenter (2000)通过利用民族志资料档案库“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中的资料, 实证证明了自我概念与松-紧文化相关(接近显著水平), 互依自我概念易产生于紧文化结构中。Gelfand 等(2011)也认为, 因为紧文化对行为严格限制, 会削弱因角色变化造成的对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影响。但有研究从人格特质论角度出发, 以自我报告方式调查了8个国家(日本、中国、美国、委内瑞拉、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被试的自我概念在不同社会角色间的一致性, 以及3种文化维度(辩证主义、独立-互依自我、松-紧文化)与自我一致性的关系。研究者发现自我概念大体上没有显著变化, 也不受上述3种文化维度影响(日本除外, 受辩证主义影响), 自我一致性主要受人格特质影响(Church et al., 2012)。在后续研究中, Katigbak 等(2013)采用跨观察者协商一致法, 测量了4个国家的被试的自我概念在不同社会角色中的一致性, 同时还测量了各被试在辩证主义、个体-集体主义、松-紧文化维度上的得分, 发现自我概念一致性美国最高, 墨西哥、委内瑞拉居中, 中国最低, 但以上3种文化维度都不能对此予以有效解释。也就是说, 后续两个研究认为, 无论自我概念是否一致, 松-紧文化都没有对其产生影响(Church et al., 2012; Katigbak et al., 2013)。

上述研究中, 松-紧文化对自我概念一致性影响的不一致结果, 并未妨碍松-紧文化研究者自我主题上的深入拓展。松-紧文化研究者发现松-紧文化与自我指导、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存在紧密联系。相对于松文化, 紧文化中的个体在自我指导上, 更能习惯性地接受道德上的必须(normative “ought” self-guides); 对他人的斥责建立在概化他人的基础之上, 表现出防御型调节定向(Higgins, 1998)。相对于松文化, 紧文化下个体的自我管理

更强,这样有助于个体避免出现不合适行为(Baumeister & Heatherton, 1996; Gelfand, 2012)。相对于松文化,紧文化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监控能力,体现出对长期情境性限制的适应力(Gelfand, 2012)。因此,自我指导、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监控呈现出了松-紧文化维度下的显著差异。松-紧文化研究者对自我欺骗也进行了理论探索, Triandis (2011)认为,松-紧文化是产生自我欺骗的文化影响因素之一(其余两种文化因素为文化的简单-复杂性、垂直-水平集体主义),文化越紧越容易产生自我欺骗。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减少自我欺骗,必须揭示出“虚假”信念所掩盖的“真实”信念。

### 3.2 松-紧文化与人格

Harrington 和 Gelfand (2014)对美国 50 个州的松-紧文化和大五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州水平上松-紧文化和部分大五人格特质存在紧密联系。相对于松文化的州,紧文化的州具有较高的尽责性、宜人性和较低的开放性,但外倾性和神经质上没有明显差异。

宜人性能否预测工作满意度,在以西方被试为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不同结果。有研究者针对紧文化、集体主义的国家(新加坡)被试调查发现,宜人性质非常显著地预测了工作满意度(Templer, 2012)。但该研究存在没有区别开松-紧文化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的局限。后续研究区分了松-紧维度与个体-集体主义维度。Peltokorpi 和 Froese (2014)借助《多元文化人格问卷》(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测量了旅居日本、巴西的 191 名被试的四种旅居人格:文化共情(Cultural Empathy)、社会主动(Social Initiative)、情绪稳定(Emotional Stability)和开放心态(Open Mindedness)。根据 Gelfand 等(2011)的研究,日本为典型紧文化、集体主义国家,巴西为典型松文化、集体主义国家。研究者发现,受国家水平上松-紧文化维度的调节,越具有社会主动性人格特征的外派管理人员在巴西具有更高工作满意度,而越具有文化共情人格特征的外派管理人员在日本具有更高工作满意度。

以上研究表明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存在相关和交互作用关系,而另一些学者给出了不同结果的研究。譬如, Löckenhoff 等(2014)认为,以往由自我报告、观察者评定的方法证明大五人格存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但是鲜有研究从感知到的

性别差异(perceived gender differences)角度去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26 个国家的 3,323 名受访者对他们所在国典型男性或女性的大五人格特征,以感知方式进行了测量,感知到的性别人格差异与社会规范(松-紧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研究说明,感知到的性别人格差异比基于文化的性别角色差异具有更明显的效应。基于 60 项价值观与人格特质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宜人性、开放性与价值观高度相关,外倾性、尽责性与价值观存在一定相关,而情绪稳定性与价值观没有显著关系。研究者把松-紧文化维度作为跨文化维度调节变量之一,没有发现松-紧文化维度在价值观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Parks-Leduc, Feldman, & Bardi, 2014)。人格与角色身份结构模型(personality and role identity structural model, PRISM)提出了从普遍特质(general traits)到角色特质(role traits)的类似金字塔模型,并依此认为松-紧文化、辩证主义、个体-集体主义跨文化维度预测人格状况是非常有限的,但融合了普遍特质与角色特质的 PRISM 模型的预测效果却非常好(Ching et al., 2013)。以上研究从感知性别差异、价值观与人格关系、特质与情境关系等方面,弱化或否定了松-紧文化等文化维度对人格的影响。

在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的关系上呈现出双方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松-紧文化与部分人格特质存在关联,并且在人格特质预测社会后效变量(如工作满意度)时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另一方认为松-紧文化等跨文化维度并不能显著预测人格状况。由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间的差异,目前对于松-紧文化与人格特质间关系的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其背后则折射出了心理学中由来已久的文化人格理论与特质人格理论之间的历史性争论身影。

### 3.3 松-紧文化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松-紧文化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心理健康议题,譬如 Embree (1950)认为相对于泰国,日本文化更容易让人神经紧张,这是造成强迫性神经症的重要因素之一,佐证了为何治疗强迫症的森田疗法会在日本兴盛起来。Embree (1950)认为紧文化容易产生强迫症的观点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认同,并认为松文化下会有更多抑郁症(Uz, 2015)。而 Gelfand (2012)关注松-紧文化下儿童的心理

则认为儿童心理痛苦在紧文化下更多表现为一种内在问题(抑郁、焦虑、退缩等),在松文化下心理痛苦更多表现为一种外在问题(活动过度、不守纪律、攻击等)。其中透露出紧文化下儿童更多表现出内在问题范畴内的抑郁症状。因此,有关松-紧文化对抑郁症的影响上存在矛盾观点,这有待进一步检验。不过,研究者都认可不同松-紧度文化下存在神经症类型的不同,并体现在情绪体验与行为指标的差异上。

Stankov (2013)认为在与松-紧文化类似的软-硬文化(hardness vs. softness)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青少年比欧洲青少年抑郁得分更高,生活满意度更低。就松-紧文化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也有来自不同研究者的不同意见。Church 等(2013)认为自我决定理论的三元素(自主、能力、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松-紧文化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但 Harrington, Boski 和 Gelfand (2015)通过 8 个指标证明:在国家层面,过松的文化或者过紧的文化都不利于幸福感,松紧适度的文化幸福感最高。上述主要从国家层面考察幸福感与松-紧文化的关系。Sortheix, Olakivi 和 Helkama (2013)调查芬兰某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对生活事件(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发现松-紧文化对价值观和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最终生活满意度会受到松-紧文化的影响。城市之间幸福感的比较研究也说明紧文化的波士顿人,与松文化的旧金山人对幸福感的感受是不同的,波士顿人倾向于在以“守旧与守成”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中感觉到更幸福,而旧金山人倾向于在“求新与自由”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中感觉到更幸福(Plaut et al., 2012)。虽然也有研究不认可松-紧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但更多的研究说明人们的幸福感受到了松-紧文化的显著影响,不过并不是单独的松文化或者紧文化让人更幸福,而是正如 Plaut 等人(2012)的研究所透露的那样,不同松-紧文化城市能引起幸福感的外界刺激并非相同,松文化或紧文化要与其它文化特征匹配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 3.4 松-紧文化与创新

松-紧文化被引入创新研究领域,相应成果对应着松-紧文化测量的三个层面(国家、区域和个体),并有学者在组织层面进行过理论探讨。(1) 国家层面:有研究采用 68 个被调查国家的价值

观、信念的标准差确定各国的松-紧文化程度,发现创新意味着引入变化,改变现状,这为紧文化特征(有序、可控、稳定)所不容,因此紧文化社会有碍于创新(Uz, 2015)。但紧文化国家针对创新的大幅研发投入,会起到积极明显的缓冲作用(Feng & Liu, 2016)。该研究通过纵向数据(1995~2010年)分析指出,在一个尊重规范、权威和权力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驱动创新的体制工具受紧文化影响更能有效激发国民的创意和创新。该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没有细致区分“质的创新”与“量的创新”,因为已有研究者认为在松紧程度不同的国家文化中,创新有着不同的表现:相对于松文化国家,紧文化国家在创新上更多是一种量的增加(incremental innovation),根本性的创新要少(radical innovation) (Gelfand et al., 2006; Muthukrishna & Henrich, 2016)。(2) 区域层面:基于紧文化对行为的限制和更少的行为选择,且与开放性人格特质存在负相关,理论上可以假设紧文化与创造力创新存在负相关(Harrington & Gelfand, 2014)。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1963~2011 年的数据表明,紧文化州人均拥有发明专利数更少;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亦表明,紧文化州人均拥有的艺术家更少(如画家、插画师、作家等)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3) 组织层面:松文化下组织在创新的频率和速度上会更快,但紧文化下组织的创新实施率会更高(Katz, Casey, & Aiman-Smith, 2005)。Gelfand 等(2006)对于松-紧文化与组织层面创新的关系问题也是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紧文化要求组织拥有更多的秩序、精确性,以及对变化的抗拒,使得组织内部愈加可控和可预测,从而不利于创新;而松文化要求组织更少的秩序与凝聚,以及对变化的宽容,使得组织内部更少的责任与惩罚,从而有利于创新。但另一方面, Gelfand 等(2006)从个人观察经验出发,又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紧文化也能促进创新。譬如,日本在持续学习氛围下,权威与规则反而促进组织创新;新加坡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虽然是紧文化国家,但也促进了组织创新。(4) 个体层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松-紧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微妙关系, Chua, Roth 和 Lemoine (2015)通过网络众包平台组织关于消费品牌的创新竞赛,发现在完成“外国创造任务”(创造性解决有关外国品牌问题)时,来自紧文化的个体明显逊于来自松文化国家的对

手。但是当紧文化的个体从事“本国创造任务”(创造性解决本国品牌问题)或文化距离接近国(根据 Hofstede 的文化价值观维度确定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譬如,美国与中国文化距离为 4.61,与印度 1.87,与英国为 0.43,与美国为 0)的创造任务时,紧文化反而促进创新。对于来自紧文化国家的个体而言,创新活动既受紧文化影响,又受到两个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松-紧文化与创新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即松文化有利于创新,紧文化有碍于创新,也并非紧文化下容易实现量的创新,松文化下容易实现质的创新;而是松、紧文化下都可以有高质量的创新。但紧文化的创新领域范围会较松文化窄,文化越紧创新领域范围越窄。其原因可能在于,紧文化成因之一是抵御威胁,一种文化越紧就会有越多的资源用于应对威胁,高质高量的创新成果多来自直接应对威胁的领域,但同时也限制了投入其它领域的创新资源。

### 3.5 松-紧文化与判断决策

判断与决策是心理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松-紧文化研究者主要围绕道德判断与决策以及职业决策展开相关研究。Han 等(2014)采用脑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研究松-紧文化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的影响。研究者选择了 16 名被试(8 名美国被试,8 名韩国被试),所有被试选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区,但均出生于各自国家,没有离开母国两年以上。研究者采用 Gelfand 等(2011)的《松-紧量表》测量了被试的松-紧文化感知水平,采用 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和 Gelfand (1995)的《自我建构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测量被试的独立-互依自我建构特征。韩国被试在松-紧文化得分上显著比美国被试高,韩国被试也比美国被试更趋向互依自我,但没有显著差异。韩国被试在个人道德条件下,社会直觉加工时的右侧壳核(right putamen)激活水平,认知控制时的额上回激活水平,都比美国被试高;在人际道德条件,熟悉情境下的右中央后沟激活水平,也比美国被试高。当阈限降低时,美国被试在个人道德条件下冲突解决过程时的双侧扣带回激活水平,在人际道德条件中陌生环境下简单认知分流(simple cognitive branching)加工时的右内侧额回激活水平,都显著比韩国被试高。研究显示,松-紧文化差异对道德决策过程

的影响,可以在相关脑区的激活水平差异中得以反映。松-紧文化对道德行为判断的影响不仅反馈在脑区激活水平的强弱上,也体现在年龄差异上。Jiang, Li 和 Hamamura (2015)从第 5 轮 WVS 数据中抽取了与 Gelfand 等(2011)研究重合的 20 个国家的 25142 名被调查者的道德争议行为判断问题作答数据,从毕生发展视角分析年龄差异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发现无论松文化还是紧文化中的老年人,都比年轻人在道德判断上更严厉。其中,松文化下的老年人则比紧文化下的老年人更加严厉,而松文化下的青少年比紧文化下的青少年,面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时更宽容。松-紧文化维度在年龄影响道德争议行为判断上具有调节作用。

在职业决策上,Guan 等(2015)基于中美大学生的个体-集体主义、独立-互依自我,以及职业决策性格(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files)的实证研究结果,从理论上推测,松文化下的个体文化导向(譬如独立自我)更能预测职业决策行为,而长期生活在紧文化中,则会增加职业决策的复杂性,使得个体投入更多的努力做出决策。在创业方面,有研究者提出了因果型决策(causal decision-making)和效果型决策(effectual decision-making)<sup>1</sup>(Sarasvathy, 2001)。de Wit (2013)采用内省报告法,从比利时和马来西亚中选取样本,仅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国家的被试更期待回报。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是效果型决策与因果型决策的较佳预测变量,而松-紧文化维度也不是。而 Corral 和 Arturo (2015)以荷兰 Twente 大学的学生为研究样本,发现松-紧文化维度既能预测效果型决策,也能预测因果型决策。

### 3.6 在脑认知神经科学和基因方面的松-紧文化研究

紧文化在社会规范上长期的强势控制势必会影响个体心理,乃至个体的脑认知神经机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程度、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和对惩罚的敏感有紧密联系(Knutson, Westdorp,

<sup>1</sup> 因果型决策,选择特定的方式以达成效果,即注重方式。效果型决策,设想可能的效果而采用特定的方式,即效果优先,决策时首先考虑可承受的损失,强调对未来的控制。de Wit (2013)总共有 5 点对比说明。

Kaiser, & Hommer, 2000; Potts, George, Martin, & Barratt, 2006), 而紧文化强调严厉规范与惩罚, 因此有研究者推测很可能与此有关(Gelfand, 2012)。ERP 研究也证明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 related negativity, FRN)与较高的惩罚敏感有关, 但与被试的学习表现、人格无关(Unger, Heintz, & Kray, 2012)。该研究虽然没有提及松-紧文化与反馈相关负波之间的直接关系, 但在排除了学习表现的认知能力因素以及个体人格因素后, 进一步增加了紧文化(惩罚严厉)与反馈相关负波存在紧密关系的潜在可能。上述研究还是通过松-紧文化的代理指标“惩罚性”来推理松-紧文化与大脑神经活动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展, Han 等(2014)在控制了其它跨文化心理学维度之后, 发现松-紧文化对道德争议行为判断的影响, 可以反映在不同脑区的激活水平差异上, 从而提供了松-紧文化与相关脑区存在关联的直接证据。松-紧文化研究不仅在认知神经科学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还进一步深入到基因层。Mrazek 等(2013)通过研究探索了松-紧文化与基因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 生态威胁易感性以五羟色胺转运体短臂基因为中介预测文化松紧性, 短臂基因通过文化松紧性预测道德争议行为的合理性判断。研究揭示了社会行为差异背后生态环境、基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开拓了松-紧文化研究的新层次, 进一步完善了从宏观生态到微观基因的研究视野,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广阔基础。

### 3.7 松-紧文化与恐怖主义、社会和谐

在暴力冲突的跨文化研究中, 学界更多关注个体-集体主义维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松-紧文化维度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Triandis, 2013)。Gelfand 等(2011)根据对 33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紧文化与暴力有很高的关联。她与合作者利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1970~2007 年间 80000 次恐怖袭击资料, 分析发现宿命论兴盛、实施强力规范和惩罚严厉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恐怖主义事件爆发率(Gelfand, Lafree, Fahey, & Feinberg, 2013)。为了防范可能的恐怖主义, 面对命运主义、紧文化和男女平权意识低的社群,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应该有应对策略(Gelfand et al., 2013)。松-紧文化视角不仅可以瞭望国际上的恐怖主义问题, 而且还可以成为建设

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的文化工具。Tang (2013)通过挖掘网络搜索引擎数据来度量社会风险, 把松-紧文化作为衡量社会风险的标准之一。和谐社会离不开安全生产, 尤其是核电安全。中国十三五计划部署了大规模的核电建设。有研究证明文化是影响核电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 而松-紧文化维度在有些社会中对核安全具有较大影响(Deetz, 2014), 尤其是在核电企业安全管理环节中(Oedewald, Gotcheva, Viitanen, & Wahlström, 2015)。

## 4 总结与前瞻

松-紧文化围绕社会规范的松紧性这一独特视角, 贯穿社会生态、历史、心理和行为、脑神经、基因等宏观和微观因素, 不仅能从生态威胁、基因等层面出发解释文化松紧性的成因, 亦可从文化松紧性预测上述层面的许多特征, 具有历史回溯性。其学理价值不仅限于跨文化心理学内部, 对整个心理学乃至社会科学和科学都有一定意义, 并且对中国的民族与区域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 4.1 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对跨文化心理学而言, 松-紧文化对社会规范的聚焦, 努力打破价值观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主导研究地位, 延展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既往的跨文化心理学直接从个体内感知去预测个体外在行动, 而松-紧文化所采用主体间性视角, 揭示了个体内与个体外的中间层——个体间的存在(Chiu et al., 2010)。它为外在文化生态因素如何影响内在心理因素开拓了新天地, 更好地解释人在社会情境因素下所做出的非个人价值观选择(Fischer, 2013; Shteynberg, Gelfand, & Kim, 2009; Wan, Chiu, Tam, Lee, Lau, & Peng, 2007; Yamagishi, Hashimoto, & Schug, 2008)。松-紧文化增进了跨文化心理学分析框架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力, 使跨文化心理学诠释文化和心理间关系的能力上升至一个新水平。

对心理学而言, 松-紧文化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情境中心理意识的外在投射。这束犀利光芒从外在的松-紧文化现象和相应社会机制安排, 烛照到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和人们普遍共享的意识存在。虽然, 有研究者认为文化情境下的个体意识是复杂多变的(Oyserman, Sorensen, Reber, & Chen, 2009)。这诚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共同的历史和生态会造就人们普遍共享的一些规范、规则和制度。

因此,每个人既有丰富多变的个体性的一面,也有共同影响下普遍共享意识的一面,而松-紧文化研究恰恰高屋建瓴地从心理意识层面反映出不同文化下共享意识的多与寡、一致性与多变性、可控性与随意性(Boldt & Roberts, 1979)。松-紧文化在主体间性上表现出的稳定性是我们开展心理测量的前提,基于自我报告的心理测量结果才具有可信度。正是从基本的有效与可信测量基础出发,才让研究者具备了对心理学诸多主题,譬如自我、创新、心理健康、判断决策、合作等,开展深入的松-紧文化研究的可能。松-紧文化可对人们共享的主体间心理意识进行反映,使得诸多心理学主题与松-紧文化相结合,成为一个个既有可能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另外,松-紧文化研究所展现出来的跨层多水平测量特征,以及对WVS、ESS等多种大型调查数据或生态、历史数据的利用,促使我们再次思索心理学研究中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多样性问题,而心理信息学所描述的数据前景及相应技术革新,为我们的这种展望提供了可能(薛婷,陈浩,赖凯声,董颖红,乐国安,2015)。

就社会科学而言,由于松-紧文化不仅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社会规范差异,亦关注国家内部州省间、组织间、社区间的社会规范差异。因此,松-紧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维度,也是一种理解社会结构的角度(Boldt, 1978; Boldt & Roberts, 1979),继机械-有机社会、简单-复杂社会等维度之后,社会科学又增添了新的社会结构诠释途径:松-紧社会结构。松-紧文化也探究人们在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的行为。因情境变换而不同的行为表现,诠释了社会结构理论之不足的互动过程,为社会结构的灵活性与僵固性、一致性与变化性、集中动员性与分散离群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松-紧文化视角创造了一套描述世界范围内社会规范强弱与惩罚力度的工具,实证探索了社会规范松紧现状的部分外在生态原因和内在心理因应。松紧性不同的社会规范情境下,个体或组织的固有文化角色与所适应的社会规范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当融入或被融入不同松-紧文化结构中去时,可以从松-紧文化视角预测其在相应社会结构下的行为模式。总之,松-紧文化为社会科学中的社会结构与角色间关系议题,初步提供了一套实证描述、解释和预测的框架体系。

就科学而言,松-紧文化广泛涉及心理、文化、生态环境、历史、政治、社会、脑认知神经、基因等社会和自然科学范畴,关照复杂社会生态情境下的文化形态和人类心理的协同进化过程,预期将对我国新兴科学研究领域“生态文明”产生学术贡献。生态文明会对人类基因型或基因表型造成影响,反过来人类的基因型或基因表型也可通过心理和行为、社会规范、文化规制而层层递进转介这种影响。文化和进化的烙印深深刻入了人类灵魂,而人类亦在生存实践中用自由意志践行印刻在灵魂上的烙印。

#### 4.2 中国的民族和区域文化松紧性差异研究

由于实行平等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中国各民族保留了各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但学界鲜有利用跨文化心理学维度透视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而松-紧文化研究滥觞于民族文化的人类学考察,民族心理学研究是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张积家,2012)。就跨文化心理学而言,这样不仅可以检验松-紧文化是否适合解释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心理差异性。而且,其业已取得的一些实证成果,如松-紧文化与社会生态威胁之间的紧密关系(Gelfand et al., 2011; Roos et al., 2015),可以为从目前民族文化状况逆推历史上该民族的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状况的研究提供佐证,从而促进中国民族心理学的发展。

从城乡或省域角度出发,开展中国区域心理学研究,既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张海钟等,2012)。松-紧文化研究者已从美国的州域、城市角度初步奠定了区域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中国学者曾根据南北方区域划分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内部的集体主义差异(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为了更紧密结合中国本土实际,面向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有必要更精细地开展城市文化心理学研究。Plaut等(2012)认为不同松紧程度的城市引起幸福感受的外界刺激条件并不完全一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其中透露的不仅仅是松-紧文化与幸福感的问题,而且反映出由于城市文化不一样,同样的外界刺激其心理效果却可能大相径庭。这可为国内的相关研究领域提供直接借鉴。譬如,除了幸福感体验以外,不同的经济鼓励政策针对文化松紧性不同的区域或整体文化差异较大的城

市,人们的体验以及受激励的效用是否一致?又如,伴随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产生大量的失范行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下,频繁出现“先犯而范”式的“中国式过马路”似的集体失范现象。乐国安(1994)曾提出解释越轨行为的“聚合作用论”,松-紧文化可考虑作为“聚合作用论”中重要的外部文化因素之一,针对“越轨行为”等城市治理对象,为指令性或描述性规范的选择及其它相应社会规范的实施提供建议。

#### 4.3 松-紧文化研究的局限与有待发展之处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松-紧文化研究刚刚兴盛,对于深刻的心理与行为跨文化研究命题的挖掘尚且不够。跨文化心理学中存在各种不同取向的测量方法,主体间性取向的方法和工具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信效度。生态威胁、基因与松-紧文化之间的协同进化观,还承受着质疑和挑战。除此之外,松-紧文化至少还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继续发展:

第一,松-紧文化视野内,针对社会规范,还需进一步甄别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为何如此(Eom & Kim, 2015; 韦庆旺,孙健敏,2013)。

第二,虽然 Gelfand 等(2011)关注了全球性松-紧文化差异,反映出人们在描述性规范上的跨文化波动。但描述性规范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尤其是不同文化下的规范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力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对于人们的情境行为反应,松-紧文化研究者认为既往的价值观分析框架不能提供足够的解释。但事实上,人们除了受到感知到的规范影响外,阈下情境刺激(如线索启动)或非语言表达(如表情、肢体动作)等等,也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趋向。为了构建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松-紧文化研究者仅仅关注描述性规范还是不够的。愈加细化松-紧文化在同一单位(个体、组织、国家)内部可能的不同侧面、不同程度的体现。譬如,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间,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间,同一个部门下不同的个体间的松-紧文化程度不一;即使是同一个体,个体不同心理侧面的文化松-紧性承载可能并不一致。这有助于发现同样的松-紧文化氛围下单位的自主因素如何对接外部的文化影响。同时,这也是解决特质论与文化论

之间争论的一种可能的途径之一。

第四,站在长远发展角度上,松-紧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在以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有所突围,但这并不是对价值观分析框架的否定。从规范的松-紧文化视角关注价值观、信念、知识、技巧的代际传递(Tam, 2015),以及规范、价值观等以外的跨文化心理领域(譬如社会公理, Eom & Kim, 2015),也是拓宽松-紧文化研究视野,迈向更坚实心理学道路的重要方向。

正如松-紧文化的集大成者 Gelfand (2012)所言,“跨文化心理学是充满尝试与挫折的道路”。松-紧文化研究在经历较长的历史酝酿和磨砺后,将厚积薄发,历久而弥香。

#### 参考文献

- 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心理科学进展*, 24, 1551-1555.
- 韦庆旺,孙健敏.(2013).对环保行为的心理学解读——规范焦点理论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1, 751-760.
- 希罗多德.(1959). *历史* (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薛婷,陈浩,赖凯声,董颖红,乐国安.(2015).心理信息学: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心理学新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3, 325-337.
- 乐国安.(1994).越轨行为诱因辨析. *社会学研究*, (5), 104-112.
- 张海钟,姜永志,赵文进,安桂花,张小龙,胡志军,张万里.(2012).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 1229-1236.
- 张积家.(2012).加强民族心理学研究,促进中国心理科学繁荣——民族心理学专栏前言. *心理科学进展*, 20, 1139-1144.
- Baumeister, R. F., & Heatherton, T. F. (1996). Self-regulation failure: An overview. *Psychological Inquiry*, 7, 1-15.
- Benedict, R.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Boldt, E. D. (1978). Structural tightness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9, 151-165.
- Boldt, E. D., & Roberts, L. W. (1979). Structural tightness and social conformity: A methodological note with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0, 221-230.
- Carpenter, S. (2000). Effects of cultural tightness and collectivism on self-concept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4, 38-56.
- Chan, D. K. S., Gelfand, M. J., Triandis, H. C., & Tzeng, O. (1996). Tightness-looseness revisited: Some preliminary analyse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1, 1-12.

- Ching, C. M., Church, A. T., Katigbak, M. S., Locke, K. D., de Jesús Vargas-Flores, J., Ibáñez-Reyes, J., ... Ortiz, F. A. (2013). Cross-cultural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personality and role identity structural model (PRISM): Implications for trait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 894–907.
- Chiu, C. Y., Gelfand, M. J., Yamagishi, T., Shteynberg, G., & Wan, C. (2010). Intersubjective culture: The role of intersubjective perception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482–493.
- Chua, R. Y. J., Roth, Y., & Lemoine, J. F. (2015).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creativity: How cultural tightness and cultural distance affect global innovation crowdsourcing work.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0*, 189–227.
- Church, A. T., Alvarez, J. M., Katigbak, M. S., Mastor, K. A., Cabrera, H. F., Tanaka-Matsumi, J., ... Buchanan, A. L. (2012).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nd short-term stability in eight cultur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 556–570.
- Church, A. T., Katigbak, M. S., Locke, K. D., Zhang, H. S., Shen, J. L., de Jesús Vargas-Flores, J., ... Ching, C. M. (2013). Need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Test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eight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 507–534.
- Corral, M., & Arturo, J. (2015, July). *Effectual decision-making explained through a perceived Loose Cultural Dimension in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A case from the Netherlan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BA Bachelor Thesis Conference, Enschede, The Netherlands.
- de Wit, T. (2013). *Tightness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The impact on new venture creation-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wente, Enschede.
- Deetz, S. (2014, April). *Cultural and national factors in nuclear safety*. Paper presented at IAEA workshop on global safety culture: National factors relevant to safety culture, Vienna, Austria.
- Embree, J. F. (1950). Thailand - a loosely structured social syste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2*, 181–193.
- Eom, K., & Kim, H. S. (2015). Intersubjective norms: 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1313–1316.
- Feng, J. B., & Liu, L. A. (2016). How national cultures influence national rate of innovation. In K. Plangger (Ed.), *Thriving in a new world economy* (pp. 70–72).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Fischer, R. (2013). Situational challenges: Putting biology, resources and multi-level constraints back into the pictur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 30–33.
- Gelfand, M. J. (2012). Culture's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420–424.
- Gelfand, M. J., & Harrington, J. R. (2015). The motivational force of descriptive norms: For whom and when are descriptive norms most predictive of behavior?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1273–1278.
- Gelfand, M. J., Lafree, G., Fahey, S., & Feinberg, E. (2013). Culture and extrem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9*, 495–517.
- Gelfand, M. J., Nishii, L. H., & Raver, J. L. (2006).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1225–1244.
- Gelfand, M. J., Raver, J. L., Nishii, L., Leslie, L. M., Lun, J., Lim, B. C., ... Yamaguchi, S.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 *Science, 332*, 1100–1104.
- Guan, Y. J., Chen, S. X., Levin, N., Bond, M. H., Luo, N. F., Xu, J. W., ... Han, X. (2015). Differences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files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mediating mechanisms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856–872.
- Han, H., Glover, G. H., & Jeong, C. (2014).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neural correlate of mor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59*, 215–228.
- Harrington, J. R., Boski, P., & Gelfand, M. J. (2015). Culture and national well-being: Should societies emphasize freedom or constraint? *PLoS One, 10*, e0127173.
- Harrington, J. R., & Gelfand, M. J. (2014). Tightness-looseness across the 50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 7990–7995.
-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 1–46.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Dorfman, P. W., & Gupta, V. (2004).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utter, M., & Pelto, P. J. (1972).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to societal "Tightness" and "Loose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 273–282.
- Jiang, D., Li, T. Y., & Hamamura, T. (2015). Societies' tightness moderates age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justifiability of morally debatable behaviors.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12*, 333–340.
- Katigbak, M. S., Church, A. T., Alvarez, J. M., Wang, C. C., de Jesús Vargas-Flores, J., Ibáñez-Reyes, J., ... Ortiz, F. A.

- (2013). Cross-observer agreement and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cross cultures: Integrating trait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 78–89.
- Katz, S. M., Casey, R., & Aiman-Smith, L. (2005). Optimizing ROI of time-to-market practices.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48*, 47–57.
- Knutson, B., Westdorp, A., Kaiser, E., & Hommer, D. (2000). fMRI visualization of brain activity during a 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task. *NeuroImage, 12*, 20–27.
- Li, C., Fock, H., & Mattila, A. S. (2012). The rol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in the ethics of service recovery. *Journal of Global Marketing, 25*, 3–16.
- Löckenhoff, C. E., Chan, W., McCrae, R. R., De Fruyt, F., Jussim, L., De Bolle, M., ... Terracciano, A. (2014). Gender stereotypes of personality: Universal and accurat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 675–694.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ead, M. (1937).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 New York, NJ: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Merriweather, K. A. (2014). *College students' memory of the imposed social norm of their Texas high school: A replication of Gelfand's tightness-looseness stud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Minkov, M., & Hofstede, G. (2014). A replication of Hofstede's uncertainty avoidance dimension acros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s from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14*, 161–171.
- Morris, M. W., Hong, Y. Y., Chiu, C. Y., & Liu, Z. (2015). Normology: Integrating insights about social norm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9*, 1–13.
- Mrazek, A. J., Chiao, J. Y., Blizinsky, K. D., Lun, J., & Gelfand, M. J. (2013). The role of culture-gene coevolution in morality judgment: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ightness-looseness and allelic variation of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Culture and Brain, 1*, 100–117.
- Muthukrishna, M., & Henrich, J. (2016). *Innovation in the collective bra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1*, 20150192.
- Ng, B. W., Morris, J. P., & Oishi, S. (2013). Cultural neuroscience: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 53–57.
- Norenzayan, A. (2011). Explaining human behavioral diversity. *Science, 332*, 1041–1042.
- Oedewald, P., Gotcheva, N., Viitanen, K., & Wahlström, M. (2015). *Safety culture and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phases*. Finland: VTT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 Oliver, S. C. (1965). Individuality, freedom of choice, and cultural flexibility of the Kamb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421–428.
- Oyserman, D., Sorensen, N., Reber, R., & Chen, S. X. (2009). Connecting and separating mind-sets: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217–235.
- Parks-Leduc, L., Feldman, G., & Bardi, A. (2014).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meta-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9*, 3–29.
- Pelto, P. J. (1968).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societies. *Trans-action, 5*, 37–40.
- Peltokorpi, V., & Froese, F. (2014). Expatriate personality and cultural fi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ost country context on job satisfac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3*, 293–302.
- Plaut, V. C., Markus, H. R., Treadway, J. R., & Fu, A. S. (2012).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well-being: A tale of two c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 1644–1658.
- Potts, G. F., George, M. R. M., Martin, L. E., & Barratt, E. S. (2006). Reduced punishment sensitivity in neural systems of behavior monitoring in impulsive individuals. *Neuroscience Letters, 397*, 130–134.
- Roos, P., Gelfand, M., Nau, D., & Lun, J. (2015). Societal threat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An evolutionary basi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9*, 14–23.
- Ryan, B. F., & Straus, M. A. (1954). The integration of Sinhalese society.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22*, 179–227.
-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243–263.
- Schwartz, S. H. (2014). Rethinking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societal culture in light of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 5–13.
- Shteynberg, G., Gelfand, M. J., & Kim, K. (2009). Peering into the “magnum mysterium” of cultur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descriptive norm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0*, 46–69.
- Singelis, T. M., Triandis, H. C., Bhawuk, D. P. S., & Gelfand, M. J. (1995).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 theoretical and measurement refinem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9*, 240–275.
- Sortheix, F. M., Olakivi, A., & Helkama, K. (2013). Values,

- life events, and health: A Study in a Finnish rural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3, 331–346.
- Stankov, L. (2013). Depress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uropean and Confucia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5, 1220–1234.
- Tam, K. P. (2015).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role of perceived norm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1260–1266.
- Tang, X. J. (2013). Exploring on-line societal risk perception for harmonious socie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 Engineering*, 22, 469–486.
- Templer, K. J. (2012).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importance of agreeableness in a tight and collectivistic Asian society. *Applied Psychology*, 61, 114–129.
- Triandis, H. C.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506–520.
- Triandis, H. C. (2004). The many dimensions of cul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8, 88–93.
- Triandis, H. C. (2011). Culture and self-decep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9, 3–13.
- Triandis, H. C. (2013). Toward understanding violence in Islam. *Acta de Investigación Psicológica*, 3, 969–985.
- Unger, K., Heintz, S., & Kray, J. (2012). Punishment sensitivity modulates the processing of negative feedback but not error-induced learning.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 186.
- Uz, I. (2015). The index of cultural tightness and looseness among 68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 319–335.
- Wan, C., Chiu, C. Y., Tam, K. P., Lee, S. L., Lau, Y. M., & Peng, S. Q. (2007). Perceived cultural importance and actual self-importance of values i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337–354.
- Yamagishi, T., Hashimoto, H., & Schug, J. (2008). Preferences versus strategies as explanations for culture-specific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579–584.

## Tight-loose culture: A new dimension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U Jun; CHEN Hao; YUE Guoan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ight-loose culture, a new dimens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the tolerance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diverse cultur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efinition of tight-loose culture, its underlying causes as well as measurement method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ight-loose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integrated into the research of self-consciousness,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and mental state.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judg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nnovation. Besides, tight-loos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that incorporates culture in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iology (gene) and national safety (social harmony and terrorism). Taking the merits of releva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to accoun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ight-loose culture) could orient the distinction of descriptive norms and injunctive norms.

**Key words:** tight-loose culture;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ocial norms; cultural anthropology